

有一个“必然”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一年一年总是在过去。去年这个时候来到的去年,今年这个时候已经过去。就像站在大江边上,看着那流淌,多想拽住它的愿望也没有力气升起。它流走得那么快,它是再不会回返的。亲爱的去年,你也舍不得曾经的岸边吗?那些浪花的跳起,是你在回头看着我们吗?我们一起艰难、努力地度过了一年,我们在你的时间里,你在我们的日子间,现在,你走了,我们还要继续着时光的滴答滴答,风起了,潮落了,既蓬勃热烈,又小心翼翼,一天天迎接,一天天度过,按着你和你之前无数年份教给我们的智慧。亲爱的去年,你放心地流着你的流吧,我们过着我们的过着,我们会在你的身后想着你,再见了!

亲爱的去年和今年

梅子涵

有一种诗意是无法消失的,那就是一年的度完总是在冬天的时候,一年的开始依旧还仍是在冬天里。但我们却总是提前地说:春天来了!因为任何一个新的四季必定是由春天开始的。春天是多么好,冬天也是那么好,我们的诗意是完整和丰富的。因为我们无法违反,所以我们不会违反,我们是聪明的。有一些浪漫是无法停顿的,那就是,哪个艰困日子里,没有人在唱歌舞蹈呢?窗外天天雨声,诗人还总是在写抒情句子,小说家不会中止开始的情节。自然里的树叶已经落光,嫩绿还是在美术的枝头。那个耳朵已听不见声音的天才,照旧谱出G小调第

一小提琴浪漫曲,D小调第九交响曲,磅礴的“欢乐颂”铺天盖地。当那个中国最传奇的九十六岁指挥家又在年末了,走上舞台,摘下拐杖,挥动轻巧的细棒的时候,我坐在宁静的座上,无法不激情地断定,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生命的指挥家,所以人类才有那么坚切的肩膀。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是足以成为一支世界的大乐曲的,因为它喊着的是人类生命永远的声音:“前进,前进,前进!”前进和欢乐,是人类永恒的浪漫。

于是,有一种“肯定”是我们不可能疑感的,那就是,有文学和艺术的日子,是令人有欢乐,有信心,有情调,有哲学的豁然开朗的。它们伴随了我们行走在流水生命的岸边,虽辛苦,却会轻松;虽难免茫然,总见到鲜艳;虽惆怅一生是那么地活不够,还是安定地看着落日西下。在那本美好的名著小说中,安详地看完日落爷爷对他的天真孙儿马提说,爷爷还在呢,在你的手心,你用力地吸吧,马提把离开了呼吸的爷爷吸进了他心里!文学和艺术真不是只属于少量的一点儿人,的,少量的一点儿人也是远远地盼望着无数的人能拥有它们。

所以,在这新的年月里,有一个询问还是我们必须询问,那就是,我们是不是真实实实在在地在年年的平常生活里,确定下了和文学、艺术亲近的机会;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拥有了艺术和文学吗?它们在桌上、墙上、床头、拎包和书包里吗?如果不在,那么一个人的活着算是富饶的吗?一个人的物质具备是完整的吗?一个孩子的童年时间算是科学地排满了的吗?他们的童年乐趣算是真正健康的吗?未来的希望算是真切可靠的吗?

有一丝闪现的灵感我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2020年注定是难忘的一年,它最重要的标识是令我们重新思考人生。

有一个朋友是做导游的,以前吐槽最多的就是带大陆团出国:粗俗、大声公、自助餐盘子堆得山一样拿回自己桌、小费斤斤计较但是大买奢侈品、贪婪喜欢抢东西、如果不抖纱巾就跳广场舞随时随地等等,总之就是一无是处每天眉毛都是拧着的。

终于疫情来了,他改行做了电商卖一些海产品不死不活的。他说午夜梦回,全是自己过去带团的盛况,全是自己举着小旗子被大叔大妈团团围住乱吵,全是美好。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这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状况,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然后一切消失。

比如家有恶妻,每天凶巴巴的,但是顶天立地,家里家外全能搞掂。你委屈十足跑去找温柔小三,伊立马离婚走人留下一个烂摊

子,我们会想着你!所有的朋友们,我们都是去年,都是今年,都是明年和后来的一年一年。有一番希望已经说了很多年很多年,从《论语》到《道德经》,从安徒生到泰戈尔,可我们还是无法不再继续说很多年很多年,那就是:多一些善意、多一些温暖、多一些秩序,多一些诗情,多一些勤恳,多一些从容,多一些敬仰,多一些爱惜,多许多许多的应该增添,多许多许多的必须减少。这许多的许多,早已被写在了书里,也等候着继续地被写出。我们不是只需要去阅读的,我们也是写出者。平凡的人也是写出者,尽管我们依然平凡。

这些心情是感叹吗?这些感叹是抒情吗?这些抒情是人性吗?这些人性是一首诗吗?那就让我无法不多情地把它献给已经过去的去年,献给已经到来的今年,也献给一年一年我们自己的生命!献出了,我就无法不喜悦了。

我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批改他们的习作,看到精彩的片段,会情不自禁地诵读起来,我的心灵和他们的灵魂产生了共鸣。当我看到他们的诗文在报刊上发表时,看到多位老年学员的诗文印成集子时,感到无比欣慰。我从老年学员的足迹和历程中,看到他们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乃至改革开放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和老年学员的情谊

鹿兆麟

我在上海老年大学授课期间,还曾组织老年学员到国内数十个景点和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去旅游和观光,既愉悦了身心,又增进了友谊。十多年里,学员们纷纷到我

子令你没心思谈情说爱。

再比如家有凶妈,大家可以温习一下北野武妈妈的故事,简直就是穷凶极恶,尽管结尾很温暖但是

不那么好的也要珍惜

张欣

过程非常不好受对不对。

我们常说要珍惜眼前人,珍惜我们手上已经有的,偏偏人性的弱点就是幻想未知的世界,喜欢自己没有的东西。

希望一切都好得无以复加。

有一篇网文说找对象,只要是条件登对的般配的,都不成。为什么,就是条件好的人都不肯将就,而男女关系这件事总得有一个人不计较,一般就是那个条件差一点的人,才有可能让两个人走到一起,好像有点道理。

然而我们不到山穷水尽又怎么可能珍惜那些不太好的,无论是人还是事,我们的眼睛永远盯着最

好的。

有一首歌唱《死了也要爱》,我们是死了也要最好的。

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好珍惜的了,因为落到我们手上的,通常不是最差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无事已经是好事。

我是一个有黄昏综合征的人,如果夜幕四合的时刻正好在大街上,看到路灯下人们行色匆匆倦鸟归返,男人提着菜、卷纸还有洗衣粉,女人疲惫地牵着孩子,一身江湖儿女的豪情降到零,我就想如果这一时刻但凡心中还有一个浑身缺点的家人值得挂念,总是好的。

有一盏灯光为自己亮着,总是好的。

这就是我在疫情年最深的感触。

十日谈 为医务人员加油鼓劲,也助力于舒缓社会焦虑气氛。

我的2020年 责编:刘芳

养虫记趣

孔强新

几次三番,我心痒难搔,拿只装过坚果的大口塑料罐,猫着腰,走近那片草丛,谛听一会儿,用木片拨动几下,只见一只草蛉跳了出来,跳到脚边的水泥走道上,我双手合拢去捕捉,然后将米粒大虫儿放进空塑料罐里。如此动作,先后捉了数只,再拔一小撮半枯青草,塞进罐里,给它们做窝。

我素喜饲鸟养虫,虽不痴迷,乐此不疲也有数十载。年少时去海门外婆家度暑假,就去捉蛴螬和纺织娘。那时小县城院落多,宅院的丝瓜藤、扁豆架、竹篱笆牵牛花间,一到天黑,伴着皎月当空、星星闪烁,纺织娘吱吱弹唱,蛴螬更是放开歌喉。沙地蛴螬土名颇具诗意,叫转扇童子,特别胆怯,白天不吭声,只有晚上叫得欢。叫声也怪,不似北方蛴螬唧唧声充盈于耳,而是咯咯像是田鸡叫。我拿手电一照,手到擒来,养在高粱秸秆笼里,饲以丝瓜花、南瓜花,将笼子挂在屋檐下,伴我度过一个个温馨的夏夜。有时我也会从桃树和枇杷树上捕捉金乌虫,用细线系着,牵在手里,让虫儿绕着圈子嗡嗡乱飞,我也跟着乱转。玩累了,手一松,瞅着飞翔的虫儿,像拖着根长尾巴,乐不可支。其实是顽童的恶作剧,当时不懂,只觉得玩得开心。

走上工作岗位后,回乡机会少了。初夏时节,听见街头蛴螬合唱的喧闹,我总会从小贩手里买上一二只翠玉或铁灰。铁灰个头大,叫声浑厚洪亮。翠玉善鸣,音质脆亮,活得也长。我养过一只翠玉,先伺以毛豆、面包虫,后喂梨和香蕉,养到十一月底才息口。夏蛴鸣到深秋是不多见的。养了蛴螬,又开始养黄蛉。大黄蛉鸣声悦耳,如珠落玉盘。藏掖胸口,更有清幽之感,仿佛山野里吹来的风,令人宁静。有一年我在城隍庙西侧旧校场路边,从一位来自黄山的虫贩那里买到两只大黄蛉,鸣声时而悠扬似长笛,时而如急雨骤下,时而又摇铃般富有节奏,竟有三种叫法。可惜,我再没有见到这种虫中精品。大黄蛉与夏蛴一样,深秋后存活甚少。我开始养小黄蛉。小黄蛉比草蛉还小,耐寒,可以数只混养在一起。寒冬之夜,耳闻虫盒里传出丝丝的蚊吟般鸣叫,恍惚间听到春天渐近的脚步声。

会后,文学写作班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学员们可在微信中互通音讯,经常交流。真是生生不息,友谊长存。



赵一新兄在论艺时有“三成”之说:“成功,成就,成道。”于艺而言,成功属于世俗认可,成就属于艺术评定,成道一世纪或也就几人而已。吴昌硕先生就是属于大器晚成的开派大师。其诗、书、画、印无所不精。尝自评曰:“人说我善作画,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而我的篆刻更胜于书法。”其间洋溢出对自己篆刻的理性自许。

从鄞吴村耕读世家走出的吴昌硕先生,天性使然,挟有一股可贵的拙朴山林之气,当这个浑然的山林气与秦汉印风的古意相承接之时,风格意识极强的他,涉刀便渐见自家风貌,当然这中间也夹杂着某些浙派诸子的影子。然他的可贵总是以“出己意”的方式践行之,寄乐于既雕既琢之中,他要展示的是他的治印世界。当然此时的他想要以彼时的个性印风,去赢得大众的欣赏是困难的,更多的时候只能“茫茫人海目藏锋”。一方面此类浑拙印风相较于工雅印风,世俗接受度相对而言显然要差。直至缶翁成大名,仍有收藏巨富者,惜佳石不愿请其镌刻。从其《缶庐印存初集》来看,五十多方印作,除数方为自己的妻儿所刻,其余均作自用印。这是个极有趣味的现象,从中透露出的信息可堪探究,西方绘画大师亦喜画自画像,是否当属同一心理?至少镌刻自用印时相对无所拘束自寄怀抱,此乃初出道的吴昌硕先生高明的选择,虽夹杂着些许无奈。在《缶庐印存初集》该辑自序中,吴昌硕不无自嘲地叙述某观者对他的印作讥讽一事。

粗率的写意印风及其某些镌刻手段的尝试,还引起他艺术圈内好友的一些微词,大词人郑文焯在自己的日记中评有:“往见老铁刻一石罢,辄持向败草上著意摩擦,以取古貌。或故残破之。故乏天趣,亦石一厄。”更有诸多遗老讥之“有江湖气”。此是古今艺术评论中的常态,尤面对新艺风的出现,由于人们对新艺术的审美,在理论批评上的缺席与滞后,当习惯于常态的审美遭遇困惑之时,时常会借助于道德解读的介入。由此可见,吴印中之写意式地辅以敲、击、凿、破、琢、残、磨等,这在如今看来正常的相辅手段,在当年开拓时是需拥有何等的勇气!高呼缶翁当不为过!

晚清的海上金石风气,终于迎来了自嘉道以来许多书法诸子前赴后继的努力实践所至的最佳成熟期,此时聚集了一批中国最为优秀的金石碑学的名宿高手,“半壁江山”实不足言其盛。晚年的吴昌硕先生也由王一亭先生极力相邀寓沪上,并正式定居上海。1912年的他于得意之时,欣然奏刀一印:“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以记其兴。至此他对石鼓文等金石碑刻浸淫已入浑然大境,又广泛吸取了汉碑及额、砖、瓦当、封泥等多方面的艺术养分为己所用。其印风在晚年形成强烈的吴派印式,刀下所呈现多阳刚、古厚、猛利、雄浑。至此,他的吴派金石之风影响并启示了一大批南北的艺术家,直至启开了后世之后写意印风。

这是一条险路,所幸吴昌硕先生最终以极其强大的个体实践,在一声“自我作古空群雄”长吟中完成了他的金石梦。

我退休后,在上海老年大学文学写作班教了十年课,先后结交了数十位老年朋友,其中有离休干部、退休工程师和医生,也有退休的教师、银行职员和会计。他们离退休后都有一个愿望,要把最难忘的人和事写下来,既可以和亲友们交流,又能让小辈了解自己的人生经历。

我从语言文字讲到篇章结构,从记叙文讲到回忆录,还赏读了名家的回忆录、游记和散文,如叶圣陶的《没有秋虫的地方》、邹韬奋的《我的母亲》等,都是写身旁的亲人,身边的小事,使学员从中得到启迪。于是,一件件往事,一个个亲朋好友,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出现在他们的笔下。一位当过医生的女学员在《出诊》中写道:“在‘文革’中,作为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青

年学生,我被分配到农村医务所,为贫下中农服务。那时出诊是常事,但夜晚出诊,认不清东南西北,逢到下雨天,泥泞路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不时还传来令人害怕的犬吠声,真是莫大的考验啊!”此时,坐在我面前的她,已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妪。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离休干部,在《入朝作战日记》中回忆当年自己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与美国鬼子拼死战斗的场景。我读着他写的一则则日记,脑海里仿佛出现了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志愿军形象。可端坐在我面前的分明是位饱经风霜、脸上布满皱纹的古稀老人。

我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批改他们的习作,看到精彩的片段,会情不自禁地诵读起来,我的心灵和他们的灵魂产生了共鸣。当我看到他们的诗文在报刊上发表时,看到多位老年学员的诗文印成集子时,感到无比欣慰。我从老年学员的足迹和历程中,看到他们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乃至改革开放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